

张光直作品系列

Kwang-chih
C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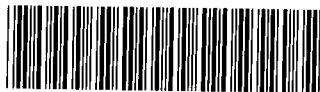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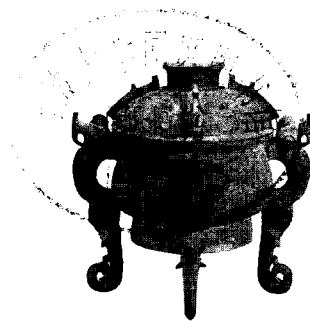
中国青铜时代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张光直作品系列

中国青铜时代

张光直 著



NLIC2970894286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青铜时代 / 张光直著. --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3.3

(张光直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4216-3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青铜时代文化-中国-
文集 IV. ①K87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6433 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 数 380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58.00元

二版序 *

三联书店要将我的两本《青铜时代》再版，合为一本。我很高兴地赞成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两本合成一本，自然比两本经济。它可以跟随一个组织，比较容易阅读。“中国青铜时代”这六个字又把这个时代的意义综合地表达出来。

像中国这样的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独一无二”(unique)的概念和存在；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在数量上，我们非常显明地注意到在中国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要比任何其他古代文明中为多；我毫不犹豫地大胆宣称：就已经发现的铜器来说，在中国古代所发现的青铜器的量，可能大于世界其余各地所发现的铜器的总和；

* 编者注：二版的《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9月）由作者将原《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9月）及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5月）合编而成。文章次序重新排定，个别篇目有调整，抽出《中国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一个青铜时代的例子》、《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后者收入三联版《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加进《商城与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商名试释》二文。

* 编者再注：三版的《中国青铜时代》抽出了《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因为此文被作者选为《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的后记，请读者参阅该书。

在中国所发现的青铜器的种类，又可能多于世界其余各地所发现的青铜器的种类的总和。人类的进化史上，不论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化的程序或原因上多么相似，青铜的重要性像在中国这样中心性的，是少而又少的。不是每个文明都有个“青铜时代”，而且近年考古学在理论上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青铜时代这个名词好像不大用了。但是为什么青铜独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大的重要性？为何独在中国考古学上，青铜时代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中心概念？

在本书里可以找到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这个答案不是很普通、寻常的答案，但也不是特殊的答案，而是一个很一般的答案。也许一开始的时候它不能得全部读者的首肯。但是请读者先将已有未有的偏见放下，将本书的说法客观地调查、研究、分析一番，很可能就有对世界古代文明的新看法。本书的意见是很新的，因此也是很不成熟的。希望读这本书的人一起将它的缺点和错误找出来拿掉，使它成为东方古代文明的发展的基本原则。

1998年4月21日

二版序 *

三联书店要将我的两本《青铜时代》再版，合为一本。我很高兴地赞成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两本合成一本，自然比两本经济。它可以跟随一个组织，比较容易阅读。“中国青铜时代”这六个字又把这个时代的意义综合地表达出来。

像中国这样的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独一无二”（unique）的概念和存在；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在数量上，我们非常显明地注意到在中国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要比任何其他古代文明中为多；我毫不犹豫地大胆宣称：就已经发现的铜器来说，在中国古代所发现的青铜器的量，可能大于世界其余各地所发现的铜器的总和；

* 编者注：二版的《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9月）由作者将原《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9月）及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5月）合编而成。文章次序重新排定，个别篇目有调整，抽出《中国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一个青铜时代的例子》、《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后者收入三联版《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加进《商城与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商名试释》二文。

* 编者再注：三版的《中国青铜时代》抽出了《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因为此文被作者选为《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的后记，请读者参阅该书。

1982 年版《中国青铜时代》前言

近年来，不但中外学者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兴趣跟着青铜器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遗物的新的考古发现的增加而逐渐提高，便是一般对文史学术稍有兴趣的人也对青铜时代的特征与来龙去脉增加了很大的好奇心。随着这些兴趣与好奇心而来的需要是关于青铜器与青铜时代的读物。在这方面的专业书籍文章虽然很多，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社会与美术特征，根据较新的资料作比较一般性的讨论的中文书却还少见。这本书便是为了适应这样的一个需要而编印的。

过去以“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作题目的书恐怕以郭沫若在抗日战争胜利一年在重庆所出的一本最为人所熟知了，可是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讲古代的学术思想的。真正讲青铜器与青铜文化的必修书是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北京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学报》专刊第 17 号，1941）与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63）。前者是叙述与讨论中国古代青铜礼器最详尽最深入的一本书；虽然出版 40 年来青铜礼器的新资料增加了很多，而且研究内容也有突进，可是像容书这样大规模的综合著作，迄今还没有第二本。郭书采用了许多新的考古材料，把考古与文献史料糅合在一起，对青铜时代的生活

情况从各方面作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叙述。想真正深入研究中国青铜时代的读者不妨从这两本书入手。

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讨论青铜器本身，也不是对青铜时代文化的综合叙述。它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一些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我相信青铜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各方面的成分、因素与特征，是彼此之间作有机性的联系的，而且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的、机械性的，而是经常变动的，并且分层分级的。研究青铜时代的每一方面，小自一件器物或它上面的纹饰，大到整个的中国政制，都得从两方面同时着手：一是它本身的性质，二是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本书所选的论文的主要讨论对象，包括城市、王制、经济、贸易、饮食、神话、美术，以及青铜器本身和它上面的装饰纹样。我们讨论它们的个别的特征，也讨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从这些方面的初步研究，我们已经看出许多中国古史上的新问题来了。因为这书是讨论青铜时代的，我们便举一些直接有关的问题：中国古代的三代从技术史上看是青铜时代，这是个事实。但是，为什么青铜器在这个时期出现？出现以后对中国文化社会史的发展进化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青铜时代社会的特征在中国历史上占着什么样的地位？与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明比较起来有何同异？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在中国的史实中，至少在青铜时代的史实中，是不是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中国青铜时代史实所表现的因果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有什么新颖的贡献？这些都是相当大的基本性的问题，我们只求把它们提出来便行了，至于它们的解决，乃是后事，但希望本书的讨论在有些方面有少许启发的作用。

本书的另外的一个目的是想试试看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例

子来证明中国古代的研究不是“专业”而是“通业”。所谓“本行”的观念我觉得害人不浅。深入研究任何一种事物、现象，都需要长期深入的训练，这是不错的，但现在所谓“行”，其区分的标准常常只是历史的偶然传统，并没有现实的理由。“中国古史”这个题目常常依照史料的性质而分为专业：有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搞古文字的人还分甲骨文、金文。这样一来，中国古史搞得四分五裂，当时文化社会各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不容易看出来了。这里所收的文章便代表一种以历史为主以专业为从的基本入手方式。但我自己也是旧传统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在许多方面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因此，这里的有些讨论很可能有各方面的错误，但这是旧训练方式的错，是我的错，不是“通业”这个目标的错。实际上要搞通业，我们个人在一般知识的训练上还差得太远。讲通业讲到底，我们还得把中国的材料与中国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各地的情形作比较，因为中国的情形只是全世界人类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形之一，不了解世界的变局便不能了解中国的常局。例如讨论商周王制与动物图像时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比较社会学与民族学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性。但可做比较研究之处还多如沧海。讲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讲不深入，但讲中国学问没有世界眼光也如坐井观天，永远讲不开敞，也就讲不彻底。

本书如果有一些这一类的特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工作在外国多年，而且以人类学为专业。人类学是重比较的，而从外国看中国学问也比较易于实事求是而少为中国习见所囿。至于是不是有可取之处，可以为容、郭两书以及这一类比较老老实实的文书做一些有用的补充工作呢，则全看读者的判断了。

这里所收的论文都是已经发表过的，最早的一篇刊于1962年，最近的在1981年，其余的则散在这20年之间。这次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好好地阅读整理了一下，却相当惊讶地发现，我在对中国青铜时代较重大的问题上的看法，在这20年间虽有增进，却无基本上的改变。其中有几篇原来是用英文写的，这次为了本书的刊印，特别将它们译成中文。英文写的文章有它的对象，有它的一定写法，翻成中文之后，颇觉诘屈聱牙，而且结构选材都有不适之感，但为了保存原样，所以改动甚少。

1981年2月23日写于美国麻省剑桥

二集前言

自从1982年《中国青铜时代》出版以来，我在一系列的论文中对中国青铜时代的一项重要的特征从各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这项特征便是作为巫术法器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在造成或促进政权集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政权的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与财富的集中紧密结合的，而财富的集中又是文明产生的基础，中国古代的艺术在文明起源的程序上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古代艺术（以青铜器为中心）的这种作用，在文明起源，国家起源，阶级社会起源这一类社会科学上的原则性、法则性的问题上，有世界一般性的意义。这本小书里面把这些论文集中在一起发表，可以再一次引起读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近来中国古史、考古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有很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一般集中在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最初起源的地区，以及中国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这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必要的，是前提性的，而近来的讨论已经导致极有建设性的结果。可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与因果关系的问题，就是中国文明社会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这样形成，它的形成牵涉哪些因素，它的形式如何反映它的内容——这一类

的问题还比较缺乏讨论。本书所收九篇论文，可以初步填补这一类的空白。

九篇论文都是发表过或即将发表的，原刊出处都注明在每篇题目下面。我在此对原出版者敬表谢意。因为原来各篇是分别发表的，彼此之间的用句与引文上有不少重复之处，所以在编入本书时略有删减。

这里的讨论有不少比较有系统地收入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此书在1988年由郭净先生译成中文，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书题为《美术、神话与祭祀》。

1989年3月27日

目 录

二版序	1
1982 年版《中国青铜时代》前言	1
二集前言	5
中国青铜时代	1
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28
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	43
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71
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	103
商城与商王朝的起源及其早期文化	128
殷周关系的再检讨	144
商王庙号新考	173
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制	211
殷礼中的二分现象	236
商代的巫与巫术	261
商名试释	291
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	299
说殷代的“亞形”	315

濮阳三趺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	328
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	336
商周神话之分类	369
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	409
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	436
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	
——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	468
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	482

中国青铜时代 *

新中国建国 30 年以来，考古学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门学科最为重大的收获是在中国文明形成阶段上的新的知识，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新知识。其他的考古新发现有的更为壮观，如秦俑坑的兵马俑；又有些发现在文化的个别方面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如云梦出土的秦律和长沙出土的帛书。可是这些发现仅只在我们对中国历史既有的知识上有所增益，而青铜时代的考古则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造成了基本性的改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 30 年以前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或至少已经开始知道了。这个新知识是从过去 30 年有关中国青铜时代的许多大大小小考古发现的积累而来的。

我们所谓中国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器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

* 这篇论文本来是 1979 年 3 月 7 日在耶鲁大学东亚研究评议会主持的休谟 (Hume) 纪念讲演会上的讲稿。原为英文 “The Chinese Bronze Age: A Modern Synthesis”，载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Wen Fong e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pp. 35-50。本题过去的综合性的论著有郭沫若《青铜时代》(重庆, 1945 年);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 1963 年); Li Chi, “The Bronze Age of China”, 载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eattle, 1957), pp. 39-59。

的重要性的时期而言的。辨识那“显著的重要性”的根据，是我们所发现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使我们对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有中心地位这件事实，不容置疑。金属器物（包括青铜器物）的初现远在青铜时代的开始以前，但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时代，青铜器的显著重要性成为不疑的事实，而现在大家相信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不会迟于公元前2000年。它的结束则是一个冗长而且逐渐的程序，开始于春秋时代的晚期，但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才告完成。如此，则依照目前的考古纪录看来，中国青铜时代持续了至少有1500年之久，虽然在它的晚期与铁器时代有好几百年的重叠。

不论我们用不用“青铜时代”这个名词来指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段时期，这一段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人称之为奴隶社会^[1]，有人称之为中国文明的形成期。^[2]如果中国历史上青铜器有显著重要性的这个阶段与用其他标准来划定的某个阶段相合，那么青铜器便有作为文化与社会界说的标准的资格。

在西方，“青铜时代”这个名词最初是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克·吉·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 1788—1865）所创用的，是代表该馆收藏品的一个新的分类的三大时代（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第二个。照汤姆森所著《北方古物指南》（*Ledetraad til Nordisk Oldkyndighed*, 哥本哈根，1836年）中的定义，“青铜时代”乃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器

[1]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1972年。

[2] Kwang-chih 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1976).

具”的时代。^[1]在他的1944年度赫胥黎纪念讲演时，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将考古学上的三大时代解释为“在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进化上的一串的相连续的阶段”^[2]。柴尔德进一步将青铜时代分为三段“方式”（modes）。在第一期方式中，兵器和装饰品有用红铜和青铜的合金制作的，但当时还没有“突变”而来的工具，而且专用于工业的器具甚少。石制工具仍旧很仔细地制作。在第二期方式中，红铜和青铜在手工业中经常使用，但不用于农畜活动，也不用于粗重作业。金属物的类型包括刀、锯和专门化的斧、铤和凿子。第三期的方式则以金属器具引进于农业及用于繁重劳动为特征，这在考古纪录上表现为金属镰刀、锄头，甚至于锤头。柴尔德很谨慎地说明了这些方式在所有地区未必都照这个顺序出现，但他很强烈地暗示了青铜器具之采用，其重要意义主要在生产领域之内。在《青铜时代》一书里，柴尔德仍将这个名词界定如次：“金属——其实红铜比红铜与锡的合金更常见——最初经常使用为主要的切割工具和兵器，以代替或补充较早的石、骨和木制装备的一个工艺的阶段。”^[3]但是他又补充说，“青铜时代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工艺的阶段”，他认为这种金属的制作和使用是和一连串的作为这个新的技术阶段的原因或其结果的一些彼此相关的变化有所联系的。这些变化包括：较有效率的生产工具与兵器，尤其是适用于车轮制作的金属锯子等的出现；熔矿和采矿的应用科学；牵涉到红铜和其他金属矿石的有组织的国际贸易的肇始；以及专门技术人员的出现。这些看法都比较新颖和成熟，但柴尔德仍旧将青铜技术当做一种环绕着生

[1] Glyn Daniel,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Archaeology* (Baltimore, 1967), p. 94 所引。

[2] V. Gordon Childe, “Archaeological Ages as Technological Stag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4 (1944), pp. 1-19.

[3] V. Gordon Childe, “The Bronze Age”, *Past and Present* 12 (1957), p. 1.